

超越本体

马克思主义意义理论研究

丁尔苏 著

苏州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 程书剑

封面设计 吴鸿钊

ISBN 7-81037-061-8



9 787810 370615 >

ISBN 7-81037-061-8
B·2 定价:4.00 元

超越本体

——马克思主义意义理论研究

丁 尔 苏 著

超越本体

——马克思主义意义理论研究

丁尔苏 著

苏州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江苏省新华书店经销

如东县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4.375 字数 108 千

1994 年 3 月第 1 版 1994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000

ISBN 7-81037-061-8/B·2 定价：4.00 元

苏州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图书若有

印刷装订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此书系国家教育委员会留学
回国人员资助费支持项目

序

《超越本体》讨论的是意义问题，因而属于符号学范畴。书的原稿用英文写成，是我在美国明尼苏达大学英文系完成的博士论文。现在将它译成中文求教于国内学术界同行。

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符号学在西方的历史也不算太长，人们通常把它的开始追溯到皮尔斯（1893—1914）和索绪尔（1857—1913）。然而，说它是一门年轻的学科是相对于物理、化学、文学、史学等其他学科而言。如果把西方的符号学跟中国的符号学相比，那它可称得上老大哥了。仅从符号学的机构史（institutional history of semiotics）来看，西方许多国家早在二十年前就成立了全国性的研究协会，而且几乎每年都有学术交流活动。各个大学也先后开设符号学课程，美国的莱斯大学（Rice University）甚至成立了专门的符号学系。有了正式的机构，有了相互交流的场所，有了源源不断的专业人员，自然就有丰硕的研究成果。除了各类期刊杂志上的文章，西方符号学近年来的研究成果主要见于美国印第安那大学教授希比奥克（Sebeok）主编的两套符号学丛书。其中一套的总题目为符号学进展（Advances in Semiotics），由印第安那大学出版社出版；另一套为符号学方法（Approaches to Semiotics），由茂顿出版社（Mouton）出版。两个系列加起来一共有将近一百二十本符号学方面的专著。可见，符号学研究在西方已经走过了概论的阶段。相比之下，我国的符号学研究则刚刚起步。到目前为止，除少数地区性的符号学兴趣小组以外，我们尚未建立

起实质性的全国符号学研究组织。就研究成果来讲，符号学方面的论文虽然时有发表，但专著似乎还不多，而且它们大多倾向于从文学研究的单一角度探讨符号及其意指活动。换句话说，要在符号学领域里实现与国际接轨，开展与国外同行之间的对话，我们面前还有一段很长的道路。每一个定义、每一篇文章、每一本专著都是朝着这一目标迈进的一份努力。我在明大专攻符号学，曾选修著名符号学家伍莱得·高泽希(Wlad Godzich)开设的符号学课程，得益非浅。现将研究之得付诸文字，希望能够抛砖引玉，促进国内符号学研究的开展。

顺便在此说明一下本书的体例。因为原作的读者是美国学术界的同行，符号学的基本概念对他们而言已经是普通常识，所以没有必要作非常具体的解释。换了一个学术结构则不然。我国的符号学研究刚刚开始，有许多术语尚未统一，这给翻译符号学方面的专著带来了一定的困难。好在国内不少学者已经注意到这一问题，并开始着手这方面的梳理工作。原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赵毅衡先生在他的《文学符号学》中花了大量篇幅阐述符号学原理。该书条理清楚，深入浅出，很值得参考。此外，美国学术界向来有实证传统。博士论文（其他学术著作、文章也是如此）一般有五分之二是引文，否则会遭到“无稽之谈”的嫌疑。本书原先是美国大学博士课程的规定作业，当然得“随乡入俗”，但这也给事后翻译造成麻烦。比如书中不少引文出自对整个西方学术界影响很大的重要著作，而它们至今尚无中文译本，我只好自己将它们翻译成中文。后现代主义理论文本有一个重要的特征，即它们都非常抽象空洞、晦涩难懂。因此，凡碰到这类的长段引文，我都将原文附在译文下面，这样读者在需要时可以对照原文，以保证原作意义的准确转达。

最后，我想借此机会感谢我的导师明尼苏达大学英文系研究生部主任鲁柏特·布朗教授、论文答辩委员会主席明尼苏达大学

文学学院院长彼特·瑞德教授以及答辩委员会其他成员，感谢他们对我的论文提出中肯的批评和建议。

丁尔苏

一九九三年九月

写于苏州大学

目 录

序	(1)
---------	-----

导言	(1)
----------	-----

研究意义理论的现实意义——两种马克思主义的传
统——马克思主义意义理论的特点

第一部分：颠倒的柏拉图主义	(10)
---------------------	------

马克思主义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与继承——柏拉图
意义理论的参与原则——感性知识是符号意义的来源
——巴浦洛夫的第二信号系统——实在论的意指三角关
系

第二部分：实在论的解构	(35)
-------------------	------

索绪尔语言学对实在论的批判——任意性原则——
差别原则——德里达对经典结构主义意义理论的批判与
发展——封闭系统的打破——能指—所指二元对立的消
解

第三部分：解构主义的解构	(59)
--------------------	------

解构主义的理论困境——先验语言系统的存在缺乏
证明——结构关系并非名、实对应之否定——符号意义
的形成有赖于经验世界

第四部分：超越本体	(90)
-----------------	------

现代哲学对意义本体的质疑——实践主体的中介作
用——语言实践与生活世界——从客观性到合理性——

语言符号的意识形态特征——意义与社会权力结构

参考文献	(124)
------------	-------

导 言

本书跟许多新近发表的意义理论方面的论文和论著一样，在一开头就不得不提到瑞士语言学家费尔迪南·德·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以及那本由他的两位学生查尔斯·巴利(Charles Bally)和艾尔伯特·薛斯格(Albert Sechehaye)在他去世以后根据听课笔记整理而成的重要著作《普通语言学教程》(Course in General Linguistics)。德国哲学家恩斯特·卡西尔(Ernst Cassirer)曾把索绪尔在那本书里所展示的语言学和符号学理论与伽利略的宇宙观相提并论。他认为后者推翻了十七世纪人们对于物理世界的传统理解，而前者则改变了二十世纪初整个人文研究的方法。确实，将近大半个世纪，索氏的理论始终在社会科学与文化研究领域占据着极其重要的位置。从方法论上讲，索绪尔语言学的分析技巧和研究成果已被直接或间接地应用于许多与人类语言有关的领域；从哲学影响上讲，索绪尔的思想则大大提高了人们对包括语言在内的各种符号在一切社会领域里所起的作用的意识。无论我们是否同意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仅就它对当代人文和社会科学研究的影响而言，这一理论至少可以为我们的讨论提供一个很好的起点。我们拿它作为参照坐标，就更容易把握自己在有关问题上的理论位置。

跟牛顿的经典力学和达尔文的进化论一样，索绪尔语言学几乎被当成一种人们赖以考察与解释周围世界的思维模式。由此，它也就免不了遭遇与这些模式相同的命运。也就是说，在其发展初期，索绪尔语言学的应用的确创造了巨大的能量，它给其他学科的

研究带来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使人们发现了不少否则不可能发现的现象。但在其发展后期,这一模式的应用却带来了许多难题,而且愈来愈多的人发现他们所面临的难题和困境来自于原始模式本身的缺陷。于是,学者们纷纷对索绪尔的理论模式提出质疑,并力图参照各方批评对其进行修改。

英国牛津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德理·依格尔顿(Terry Eagleton)在他的《文学理论》一书中说:“从索绪尔、维特根斯坦一直到当代文论,二十世纪语言学革命的标志是承认意义不是简单地在语言中得到表达或者反映:意义是由语言产生的。”^①这句话至少包含以下三个独立的命题:第一,在索绪尔意义理论中,符号意义被看作是结构区分的效应(effects of structural differentiation);第二,意义理论是索绪尔语言学的“标志”,是它的核心;第三,索绪尔语言学理论是近代思想史上的一次“革命”,它推翻了二十世纪前所有的语言学理论。我们可以从这些命题的逻辑关系中推演出一个假设:既然索绪尔的意义理论在他的整个思想体系中占据如此重要的地位,而他的思想又对当代学术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那么,我们现在所面临的问题很可能就与他对意义的特殊解释有关。

事实上,当今十分令人头痛的“后结构主义”或者叫“新结构主义”就是继承了索绪尔的经典结构主义意义理论。法国哲学家和文艺理论家雅各·德里达(Jacques Derrida)在其最有影响的著作《文字学》(Of Grammatology)中发展了索绪尔关于意义是结构区分的效应的理论。他从这一原则出发否定了任何获得稳定意义的可能性,因为按照索绪尔的原则,一切符号都逃脱不了其他符号的无声游戏,而德里达的符号系统又是开放型的,所以符号不可能象索绪尔所说的那样最终将自身与其他成分区分开来。德里达在这

^① 伊格尔顿:《文学理论》第60页,明尼苏达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

里强调的是无止境地延缓能指(signified)之到来的全方位意指活动,即在无休止的意指行程中出现的永久不稳定性。这一解构理论对当代学术研究产生了极大的负作用,它甚至影响到我们日常的阅读和交谈行为。如果人们朝着德里达指引的方向往前走,所有意义都将被解散,任何文字工作都只是玩耍符号游戏,其唯一的目的就是娱乐。利奥塔德(Jean-Francois Lyotard)的理论就是这一解构立场所产生的后果。在他的“后现代主义”世界里,多种符号游戏可以相互并存,兴旺发达,人们没有必要浪费时间和精力去达成某种共识,因为任何统一的认识都将破坏符号游戏的多元性。这样一来,“我们所能做的仅仅是为话语种类的丰富而感叹”,为意义的失落而感伤。^①

面对这虚无主义的理论潮流,不少人认为它根本不值得一驳。他们持这种观点的理由是,德里达及其追随者无法回答一个最基本的常识问题:假如一切传达意义的努力都是徒劳的,为什么有那么多基督教徒花费那么多的时间和精力去印刷圣经,而且不厌其烦地向人们作宣传和解释?他们甚至把问题针对德里达本人:既然没有任何文本具有可供把握的确切含义,德里达又何苦惨淡经营,连篇累牍,撰写如此多的哲学著作?他要向读者苦心推荐的是什么?假如德里达是想通过自己的书本向人们揭示某种观念,为什么他自己的文本可以包含确切的意义,而别人的却不行?这些问题都问得很有道理,而且一针见血,但笔者认为还远远不够。任何理论,如果要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就必须能够迎击来自敌对阵营的各种挑战。德里达和他的追随者们使得一些早先存在的观点死灰复燃。有些人以为那些问题已经解决了,但它们却以新的形态在德里达的哲学中出现。拒绝在理论上同他们展开讨论和争辩只能表示我们没有正视当前的文化与社会研究现实。这种做法将不利于吸收

^① 利奥塔德:《后现代状况——关于知识的报告》第26页,明尼苏达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包融二十年来学术界许多有益的讨论成果。所以,我们应该采取一种积极的态度,也就是说,要研究那些所谓的“异端邪说”,抛弃其荒谬部分,吸收其合理成分,以求在哲学方法论上取得一个更加令人满意的视角。《越越本体》就是基于这一态度,把新、旧结构主义意义理论与东、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都看成多边对话的一方,并将认真分析和讨论它们各自提出的观点及论据,力求对当前的理论研究状况作出一个公正的评价。

本书副标题使用了“马克思主义”这一术语,在这里有必要说明一下它的内涵。英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莱蒙德·威廉姆斯(Raymond Williams)曾写过一本题为《马克思主义与文学》的著作。他在那本书中列举了两种大相径庭的马克思主义,即经典马克思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在此之前,人们通常只有关于一种马克思主义的概念。威廉姆斯的这一划分在马克思主义学者中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在西方尤其是这样。按照威廉姆斯的解释,经典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固定不变的理论和教条体系。马克思原先创立的学说仅仅由唯物历史观和政治经济学批判组成,他本人并没有宣称自己提供的是一个包罗万象的世界观,然而他的继承者们却努力将他的思想朝着辩证唯物主义的方向发展成了一个统一的世界观。这一全盘化的努力最终导致了前苏联共产党和政府的官方哲学。一旦马克思主义被官方规定为全民哲学,它就成了无所不包的世界观,人们所能做的就是具体应用它的基本原理。无论何种思想,只要它与已知马克思主义原理不相符合,就会被指责为非马克思主义、修正主义或资产阶级而遭到排斥。由于苏联式的经典马克思主义总是从单一的角度去解释世界,这就使得它逐渐变成一个封闭的思想系统,不能及时吸收和消化来自其他自然和社会研究领域的最新成果。

区别于上述这种包罗万象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是威廉姆斯所谓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或者叫新马克思主义(Neo-Marxism)。按

照威廉姆斯的说法,西方马克思主义起源于乔治·卢卡奇(Georg Lukacs)和卡尔·柯尔斯(Karl Korsch)的早期著作。他在《马克思主义与文学》里这样说:

就在二十年以前,特别是在讲英语的国家里,我们还可以把马克思主义看作是一个固定不变的理论及教条体系,……现在的情况已不大一样。在许多领域里,特别是在文化理论中,马克思主义得到了一次振兴,而且它的理论发展也具有了开放性和灵活性。^①

引言中最后一句话“它的理论发展也具有了开放性和灵活性”对威廉姆斯来说特别重要,因为他将这一点看作是区分两种马克思主义的本质特征。他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更加强调批判的重要性,这当然也包括它对自身的批判。因而,有人把它称为“批判的马克思主义”(Critical Marxism)。

威廉姆斯对马克思主义研究现状所作的概括当然是很有参考价值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近几十年来在西方文化研究领域里确实非常活跃。它的研究角度相当多样化,从让-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re)的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路易·阿尔都赛(Louis Althusser)的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到基于德国古典哲学的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家们努力从各个方面去研究整个后工业化社会中新出现的文化现象,因而成果亦比较丰富。但威廉姆斯把东方马克思主义简单归纳为固定不变的教条似乎失之偏颇。事实上,即使前苏联的马克思主义也不是一个一成不变的思想体系,它也是随着社会形势的不断变化而变化的。不仅如此,许多观点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眼里可能是新的见解,但在经典马克思主义学说

① 威廉姆斯:《马克思主义与文学》第1页,牛津大学出版社1977年版。

中,它们却已经是老生常谈了。就拿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非常热中的“权力理论”(theory of power)为例,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曾对这一问题有过大量的论述,虽然两者研究的着重点不尽相同。因此,把经典马克思主义或东方马克思主义简单归结为教条而加以排斥显然不合情理,更与西方马克思主义为之骄傲的“开放性”和“灵活性”立场相违背。本书作者认为,无论是东方马克思主义,还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或者是其他什么思想流派,都应该被看成是多边对话的一方。在符号学研究中也是如此。从任何角度去阐述符号意义问题都是一种理论建构,而这种建构只能在同其他理论流派或思潮的对话中才能产生。也就是说,东、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之间应该展开讨论,相互取长补短,只有这样,才能对当代社会诸种文化现象作出比较令人信服的解释。《超越本体》即本着这一精神对符号及其意指活动作一初步的探讨。

虽然现在已经不会有人怀疑是否有一个马克思主义思想传统的存在,但否定马克思主义语言学或者马克思主义意义理论的存在西方学者却为数不少。从某种含义上讲,他们的观点也不是毫无道理的。与其他理论流派如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学、莫利斯(Charles Morris)的行为主义符号学、雅柯布森(Roman Jakobson)的功能主义意义理论相比较,马克思主义还没有提供一个类似的系统考察符号形式与功能特征的严密程序。但是,如果越过对具体结构的描述,我们就不难发现,马克思主义在符号与人类知识的一般关系上有许多独到见解。从其研究对象来看,马克思主义意义理论非常关注那些最基本的文化人类学问题,特别是关于人类语言的起源以及人类语言的本质。按照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的解释,语言产生于人们相互交往的需要并由此演变和发展,语言的本质即它的社会性。马克思主义意义理论的另一个侧重点是对符号、思想以及外部现实之间相互关系的研究;其总的倾向是把符号与思想看作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马克思主义意义

理论所关注的第三领域是符号与意识形态之间的相互关系,认为符号是意识形态的承担者,而符号意义则是各个社会阶级或群体之间权力斗争的效应。不难看出,与结构主义、行为主义、功能主义或其他流派相比较,马克思主义理论更加强调语言和其他符号的社会性质。

此外,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历史也表明马克思主义意义理论的存在。马克思本人就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等多本著作中讨论过有关语言符号的问题。恩格斯曾经是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学生,并具体研究过某些原始部落语言的变格变位及语音特征。两位导师把研究某种语言同考察使用这一语言的社团的历史结合起来,为以后的马克思主义意义理论奠定了理论基础。这一思想传统在二十世纪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和丰富。由于马克思主义在前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里是官方哲学,人们自然大多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去研究和解释各种自然界和社会历史现象,对于符号意指现象的研究当然也不例外。就意义理论而言,这段时期出现了两位重要人物。一位是维格斯基(Lev Vygotsky),他强调人的意识的建构性与社会性;另一位是瓦洛辛诺夫(V. N. Volosinov),他把符号领域看作意识形态斗争的场所。还有一本在斯大林名下发表的重要理论著作《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基于不同的社会制度可以使用同一种语言这一事实,该书把语言符号解释为全民的交际工具。由于作者当时的政治地位和影响,这本书成了社会主义国家内被引用最广泛的一本意义理论著作。有人认为,从马克思主义角度专门讨论意义问题的著作为数很少。这一点当然不可否认。但是,我们应该看到,马克思主义理论在阐述人的意识、意识的形态以及认知理论时则涉及到大量与符号意指活动相关的重要问题。许多概念和命题(比如符号的社会性、符号与现实世界相互依存、符号是意识形态的凝固形式,等等)现在听起来似乎很普通,而且常常被人们用作讨论意义问题的前提,然而,倘若没有马克思主义理论家